

韩国社会学学会编

# 韩国社会走向何处

東方出版社

669

# 韩国社会走向何处

韩国社会学会编 周四川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祥秀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朱 强  
责任校对：李俊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社会走向何处/韩国社会学会编；周四川译

HANGUO SHEHUI ZOUXIANG HECHU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12

ISBN 7-5060-0445-3

I. 韩...

II. ①韩... ②周...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韩国 ②工业经济-研究-韩国

IV. D312.669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7.75

字数：196千字 印数：1—1500册

定价：8.00元

## 前 言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 (August Comte) 早就说过：“为预见而观察”，认为历史和社会变动的源泉，在于人类知识的逐渐开明。自孔德以后，即使说社会学一向关心的仍然是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并以此为立足点阐明未来，也许并不过分。杜尔凯姆 (Emile Durkheim)、马克思 (Karl Marx)、韦伯 (Max Weber) 等古典社会学者，自不待言，对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近代化理论、从属理论等等有过贡献的许多社会学者关心的，虽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但却可以说，都毫无例外地集中在现实和未来的辩证法的关系上。

众所周知，近来由此更进一步，一门称为“未来学”、定向为综合科学的特殊学科正在酝酿之中。六十年代，由美、英、法、德、澳等国发起的未来研究所的活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61年，在儒弗内尔 (Bertrand de Jouvenel) 的倡导下，法国组织了一个叫做“未来研究协会”的研究团体，对未来问题开始十分慎重的又有一贯性的研究；英国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内，作为类似的研究机构，组织一个“关于向后30年的委员会”，开始对未来问题的研究进行通力合作。但是，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开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积极地研究未来问题。1965年10月，美国学术院内创建“2000年委员会”以来，该委员会召开了几次有大学教授和政策研究专家参加的、关于21世纪的未来社会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美国学术院的机关报《代达罗斯》 (Daedalus) 在其1967年夏季刊中，以“面向21世纪：进步的事业”为题，重刊发表了该讨论会的成果。不仅如此，该委员会

的主席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将此内容编辑成册, 于1967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公诸于世, 以唤起全世界有识之士关心研究未来。另一方面, 赫尔曼·卡恩 (Herman Kahn) 任过所长的赫德森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也在美国学术院的支持下, 坚持开展全面的未来研究。

世界各国如此热衷于未来的研究, 从这个视点出发, 韩国社会学会也尝试过以对韩国社会现实的社会学分析为基础, 预见我们的未来, 在这种意图的驱使下, 曾以“未来的韩国社会: 挑战和应战”为主题, 于1983年9月16、17日, 假梨花女子大学召开了专题学术讨论会。这种尝试之所以成为现实, 是因为本学会希望, 在前瞻韩国社会今后向更加开放的高度产业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透视韩国社会结构上的、文化上的变化方向和各种问题, 能动地摸索出一套能够应付预计在这一变化的漩涡中出现的社会、心理上的冲击的方案。

为实现这个目的, 本学会尽可能把所有制度上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分析的对象之内, 并邀请专门学者按不同小主题分担研究课题, 分组发言, 展开讨论。此外, 还让执笔者都了解撰写论文的一般方针, 要求每一篇论文都能作为一篇独立的学术论文, 必须是在各种文献、统计、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经实际验证的考察, 既剖视过去的变化, 又有透视将来的深刻入微的论证, 从比较研究的脉络中, 灵活应用发达的和发展中的产业社会的变化过程的历史经验, 以提高讨论的可信程度。

本书收录的这些论文, 是根据本学会的计划, 在两天的专题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至于每篇论文的优缺点, 让各位读者自己判断。但是, 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些论文起码对今后讨论如何对待韩国社会的变化, 可望是个有意义的推动, 因此, 本学会决定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 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不管怎么说, 我们希望这本小册子能成为一付小小的刺激剂, 进一步推动社会学同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分析韩国社会的现实和

未来。

这里，谨向执笔的各位作者，亲临分组及综合讨论会的社会学界各位同行，以及为编辑本书并以现在这样的篇幅出版而付出艰辛劳动的各位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向整理讨论内容的汉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表示感谢，也要向为本学会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提供方便的梨花女子大学和社会学系研究生表示感谢。同时，要向为这个研究工作，自始至终忙于筹划、具体安排的劳苦功高的社会学界各位工作人员深表谢意。最后，借此机会向支持这个研究工作的现代社会研究所的所长、研究人员以及编辑室的各位先生，再次表示深深的谢忱。

韩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郑喆洙

1983年10月

# 目 录

前 言	( 1 )
<b>第一章 展望官僚权威主义下的民主</b> …………… 韩相震	( 1 )
1. 序言	( 1 )
2. 出现背景与重要因素	( 3 )
3. 几个典型的特征	( 8 )
4. 体制运作动态	( 11 )
5. 民主的展望	( 20 )
6. 结束语	( 30 )
<b>第二章 产业发展和劳动市场的变动</b> …………… 李珪范	( 33 )
1. 序言	( 33 )
2. 国际分工和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34 )
3. 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	( 38 )
4. 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结构的变化	( 48 )
5. 结束语	( 50 )
<b>第三章 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展望</b> …………… 洪斗承	( 53 )
1. 六、七十年的变化	( 53 )
2. 八十年代以后的变化	( 67 )
<b>第四章 七十年代的宗教发展及其前景</b> …………… 卢吉明	( 73 )
1. 序言	( 73 )
2. 韩国宗教界的发展趋势	( 74 )
3. 韩国宗教发展的诱因	( 74 )
4. 向工业社会发展与韩国宗教	( 77 )
5. 结论与前景	( 80 )

<b>第五章 韩国文化的变化与展望</b> .....	<b>林嬉燮(83)</b>
1. 韩国文化的现状.....	(83)
2. 文化变革的前景.....	(89)
3. 结束语.....	(96)
<b>第六章 人口现状和展望未来</b> .....	<b>李兴卓(98)</b>
1. 迄今人口变动的趋向.....	(98)
2. 面向21世纪的人口展望.....	(105)
3. 人口分散和环境.....	(121)
4. 要点与结论.....	(125)
<b>第七章 城市化和农村开发</b> .....	<b>金东一(127)</b>
1. 问题的提出.....	(127)
2. 大城市人口集中与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开发政策.....	(131)
3. 新的农村开发的方向.....	(140)
<b>第八章 产业化和新家长制</b> .....	<b>曹恩(151)</b>
1. 序言.....	(151)
2. 家族的变化.....	(153)
3. 劳动市场中的男女差别.....	(156)
4. 家长制的变形.....	(161)
5. 概要和展望.....	(167)
<b>第九章 青少年与学校教育</b> .....	<b>金炳祥(170)</b>
1. 研究目的.....	(170)
2. 我国青少年教育发展趋势.....	(174)
3. 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的选拔、分配功能的实际情况.....	(177)
4. 教育与社会阶层变动.....	(182)
<b>第十章 科学技术和韩国社会的未来</b> .....	<b>金文朝(187)</b>
1. 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	(187)
2. 韩国的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影响.....	(191)
3. 展望与问题.....	(197)
4. 结论.....	(203)
<b>第十一章 韩国社会的传统和变化</b> .....	<b>洪镛履(204)</b>
1. 序言.....	(204)



27704710

2. 两班身份社会的基本结构	(204)
3. 19世纪中叶两班身份社会的危机	(207)
4. 初期开化派的两班身份社会观和向往市民社会	(209)
5. 废除两班身份社会，迎来市民社会黎明	(212)
6. 独立协会的建立市民社会运动	(215)
7. 爱国启蒙运动和市民社会	(218)
8. 结束语	(220)
<b>第十二章 韩国社会发展论序论</b>	朴永信(222)
1. 前言：社会学和自我认识	(222)
2. 传统类型和社会发展运动	(224)
3. 发展走向的结构和过程	(227)
4. 发展社会的文化上的展望	(231)
5. 结束语：韩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学的使命	(235)
 作者简介	 (238)

# 第一章

## 展望官僚权威主义下的民主

韩相震

“将政治体制与社会其他侧面联系起来观察，可引出这样一个一般化的结论：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国家愈是富裕，坚持民主的可能性相对愈大。”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历史当中，有人假定民主与产业经济互为关系，这种说法业为众多事例所证实，与后来发生的事件也鲜有互相矛盾的例子。在对五十年代末拉丁美洲各国进行单纯的比较研究中，利普塞特（Lipset）认为，经济发展与实现民主的程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相互关系。但是，这种说法被完全否定了。1964年，巴西发生的结束民主的军事政变，并非巴西绝无仅有的独特事件，而是类似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南美诸发展中国家接连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的序幕。对巴西选举政治瓦解的研究，因而具有新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理由，分析家们试图找出周边资本主义各国共同的结构上的因素，并倾向于据此说明这种现象。”

### 一、序言

上述引文明显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即利普塞特的看法，常被作为一向称为政治发展论的观点来对待，根据此种观点，工业化和民主化之间，其相互关系是肯定的。与此相

反，后者的观点作为代表当代统称为官僚权威主义理论的看法来认识，根据这种观点，其假定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如上所述的可能性，但是，在当代新兴工业国面临的结构条件下，上述的根据，并非令人深信不疑。就如奥多内尔 (O'Donnell) 所强调的那样，在这些国家中，随着工业化的进行，民主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恰恰相反，连既存的民主体制也日益崩溃，出现了民主为官僚权威主义所代替的倾向。

十分明显，对民主的天真的乐观想法，由此撞碎殆尽。无论从经验上、或从理论上，那种只要实现经济增长，民主就随着同步发展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再也靠不住了。但是，从一开始就把民主与工业化判定为互不相关的问题提出来，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那么，在建立当代半周边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实施民主果真那么困难？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就可能如同过去那样，讨论似将终结，同时感到讨论又非由此开始不可，因为无论谁，都不会对民主持彻底的悲观主义态度，持重视官僚权威主义现实的立场的人们，虽然意识到妨碍实现民主的内在因素是多么深刻，但同时也深知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因而指出，民主的问题就如潘朵拉盒子一样，既有诱惑性又令人战慄，作为不知何时应予以实现的体制问题留了下来。另一方面，发展论者认为，由于伴随近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复合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扩大民主社会的基础。

以这种理论上的前瞻性为背景，应如何理解、阐明韩国的政治现实呢？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展开多种形式的探讨。本文的出发点，是拟将韩国的社会现实，暂作为官僚权威主义的基本概念来理解并加以阐述。如这一点能够成立，就对这个体制的诸种特征略作剖视，探讨一下在实行官僚权威主义的过程中，民主的问题是如何以及必然要出现的前景。因而本文的基本目的在于，从官僚权威主义的现实出发，阐述其存在的原因，同时努力探索在其内

部开展民主的可能性。

## 二、出现背景与重要因素

首先必须强调，从历史上看，官僚权威主义一向有多种类型。例如，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1964年以后的巴西以及战后的东欧社会，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官僚权威主义，但许多方面存在差异。

本文要探讨的类型，首先是随着周边资本主义外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的形态出现的官僚权威主义。“适应”一词的含义，并非单指对政治结构持消极的或被动的态度。恰恰相反，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在由于工业化的结果引起新的问题的情况下，由国家及时处理，以创造持续工业化所需的条件的积极的一面。

但是，在这个类型之内，实现官僚权威主义的过程与达此目的运用的战略，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各具特点。例如：属于同一类型的官僚权威主义的南美地区与韩国，尽管具有明显的结构上的类似之处，其发展过程与战略方面，却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对具体事例的特殊性的关心程度，应不亚于对同类型的共同点。

官僚权威主义在韩国社会开始明显地固定下来，始于1971—1972年世称“维新”前后的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以此为前提，笔者拟根据几个重要方面，探讨一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官僚权威主义的出现起作用的新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现分几个重点分析如下：

(1) 首先应指出的是，韩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发展。1962年以后的第一、二次经济开发5年计划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1962年至1973年之间，经济上保持年均9.07%的增长率。这种惊人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外贸易的明显增加。韩国依赖进出口的水平，1961年，出口只不过1.9%，进口为15.0%；1962年至1965

年期间，各自增长到6.90%与15.45%，1966年至1973年，更呈现出急剧增长的势头，各上升到17.73%与26.23%。这样，自1962年至1973年期间，韩国的经济创造了出口年均增长38.73%，进口年均增长23.68%的记录。这成为解释韩国经济飞跃发展，主要依靠扩大海外机构的根据。

(2) 这种经济增长的内里，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政府制定了严密周到的计划、韩日会谈、越南战争等政治事件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世界市场友好的动向。但是，众所周知，首先是大量素质高、低工资的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与出口有关的劳动人口急剧增长，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加速步伐，便成为七十年代初，韩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例如：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59%；雇佣结构方面，总劳动人口中，被雇佣者的比率，从1960年的22.0%上升到1970年的38.8%，这暗示劳动人口迅速增长。

但是，对照历史经验和劳动市场的理论，通常的惯例是，不受限制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一旦结束，劳动集团组织化的比重就会显著增加，经济上、政治上的交涉能力不断提高，随之就会要求提高工资的水平。七十年代初，韩国社会闲散劳动力进行有组织的行动的现象，有目共睹。工资结构随劳动市场的行情，涨落幅度很大，从事公务、管理、技术等职业的工资大幅度提高。但是，1962年至1973年之间，总劳动人口的年均实际工资上升率为6.25%，大大落后于同期间增加的11.23%的劳动生产率，众多的非事务、非技术职业的工人大众的工资，停留在低工资水平。这就成为日后劳资纠纷的重要温床，实际上，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引发的劳资纠纷，在七十年代的韩国社会，有时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

(3) 建国以后至维新这段期间，韩国的政治生活，起码在形式上，保持了民主的框架。虽然持续进行的“改宪”中断了和平更迭政权的可能性，存在执政当局利用权力和金钱介入选举，以

及选举过热的现象，但是，国民直接选举自己代表的选举制度仍然没有中断。正是这个原因，可以说，通过政治渠道，反映国民意向的通路并未堵死。换言之，虽然依靠由技术官僚主义表现出来的政治主张进行行政管理，但是，国民政治上反映出来的意向，在选举制度中仍强烈表现出来。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民众与政治生活并未完全隔离，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原则上可能实际上也发生过。这种作用发展成为对掌权者构成巨大威胁的形态，可以说就是1971年的总统选举。

(4) 从思想意识的情况看，在执政者内部，业已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国民大众梦寐以求的脱贫愿望有可能实现，民族中兴之路，唯有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说，对此问题的一致看法，也日益广泛地扩散到社会集团。不管对第三共和国的褒贬如何，起码主张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这一观点，在各行各业的集团中颇具号召力。但是，这种增长意识的核心，并不只局限于民族中兴之路在于发展经济这一点上，紧接而来的是，提出了为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迅速提供达此目的的各种必要条件，即政治生活必须高效率、必须合理化的观点。极言之，作为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辛地进行近代化建设的国家，应竭力消弭妨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上的混乱和浪费。从这一观点出发，消除政治生活的低效率和浪费，使之能动地适应顺利推动近代化建设的思想，对各阶层都具说服力，易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

(5) 一般地说，外向型水平高的经济开发政策，其波及的效果影响到国民的一般生活，具有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巩固的社会安定局面的倾向。经济增长初期，总的说来，比较顺利。但是，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变动在各个水平上普遍出现，劳动市场得到补充，情况的发展导致新的局面。因为这时各个社会集团的期待意识水平日益提高，围绕着政治参与和财富分配的冲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引导外向型国民经济的国家，就会面临从根本上封死日益多面化的社会冲突的根源，确保社会

安定的客观形势。因为毫无疑问，激烈和持续的劳资纠纷或政治骚乱，必然从正面直接威胁可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留住国外资本和吸引国外客商。这意味着，只要外向型的工业化政策不从根本上进行修正，从受制约的体制的发展理论上讲，打开这种局面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确保社会安定。七十年代的韩国社会，许多方面与这种历史局面相似。

(6) 前文提到，工业化的过程并非仅仅带来技术劳动从业人员的增加，也导致以实际受惠阶层出现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扩大。换言之，伴随工业化的过程，韩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急剧分化。笔者认为，在这种阶级分化的发展过程中，警惕过激的变革，珍惜社会安定的意识，是否在七十年代的韩国社会，尤其是中产阶层中，广泛固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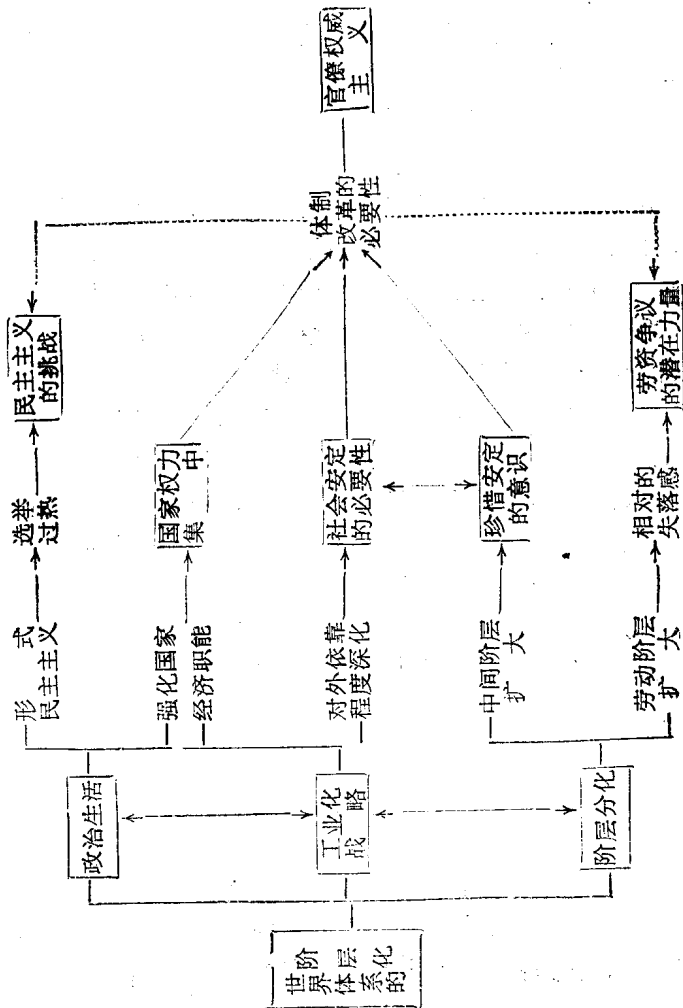
(7) 最后，有一点应该提到，以国家为主导、以出口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的政治效果。诚然，这一模式与英国、德国等西欧式的工业化模式有所不同，但是，又保留着有别于南美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的特征。简言之，其核心在于，进行工业化，不但谈不上权力的社会分享，而且情报、组织、司法、经济等方面的权力，反而进一步集中到国家机关手中。七十年代初进行的向官僚权威主义过渡的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以过激的方式，而是以比较稳健的制度改革形式进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综上所述，向官僚权威主义过渡的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从(1)和(5)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面中，以(4)、(6)、(7)的各种条件为跳板，以适应(2)与(3)的对策，拟定把国民大众从政治生活中隔离开来的一系列代替政策的方案，简言之，通过选举制度等等的改革、消除民间团体政治上日趋活跃的可能性，紧紧抓住社会安定这一关键，并据此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开发，以期涵盖政治上不同形式的体制改革。

上文概括论述官僚权威主义的出现背景与各种主要原因，现用因果关系的框架整理如下(见表1)：

(续1)

官僚权威主义的出现背景及各种主要原因





〔表1〕的基本意图在于，提示三个与体制改革相联系的核心变数和两个牵制体制改革目标的、诱发冲突的领域。拙见认为，韩国社会出现的官僚权威主义，在〔表1〕提示的背景与因果关系的框架内，是否在一定的程度上，可经由揭示类型的共同性和事例的特殊性的方向予以说明。

这种因果关系发展的结果，最终导致出现这样的特点，政治行政化、效率化、合理化。诚然，这里说的效率化和合理化的概念，几乎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尺度来测定考虑的。换句话说，政治上主要关心的是，现在应如何尽快及时地提供经济增长的各种条件，如何从根本上抑制或根除妨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形成体制改革的核心。众所周知，南北对话之类的戏剧性事件和国际政治形势对此也起作用。但是，细致观察一下，这些不过是外部因素；深入研讨一下维新前后的各种措施明显表现出来的、意图达到的结果，就可看出事情的本质也是在于：显著减少政治上依靠国民的程度，令政治非政治化，政治行政化。这样看问题似更恰当。此外，这种现象的因果过程，只用强化政治权力，或以长期执政之类的政治学上的理由，不能完全说明清楚；只有将其置于工业化战略的结果、政治生活以及阶层分化的结果相互结成的因果关系的网络之中，才有可能理解透彻。

### 三、几个典型的特征

前文我们探讨了官僚权威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是政治结构适应因工业化外延的结果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渗透到一般社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官僚权威主义首先要进行实质上的工业化，并相应扩大国家的职能。因为只有这样，官僚集团才有可能成为承当起行政和管理的势力。

官僚权威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其组织的运作方式和决策过